

# 帝國之眼：唐代「大象報恩」 故事新探

鄧郁生

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 提 要

動物報恩故事向因其重情重義的敘事內容，予人敦品勵德、仁洽萬物之閱聽感受，唐代大象報恩故事亦然。但若檢視其題材淵源與創變，實可發現文本縫隙裡耐人尋味的文化倒影與時代脈動。本文以五篇唐代文本為考察對象，追溯其與漢典、佛經之承衍關係，並就援助情節所述「拔刺」、「除獸」及「吞象怪獸」原型，考其由來與嬗變。其事或本諸佛經慈悲護生理念，然在結局處卻直承漢典事例作風，強化豐厚報償與人事描寫。其所羽蛻新出之餽贈內容——象牙——實胚根於唐代物質習尚，此類故事亦因此成了唐人酷嗜象牙的欲望鏡像。此外，《廣異記》所收兩則故事更於文章後半特書象牙「貿易」與「貢獻」，並透過角色位階之設定，隱含中心對邊陲的政治論述；故事時間所指涉之盛世記憶，乃立身中唐的作者假託文學表述而重建家國自信的嘗試。要言之，唐代大象報恩故事誠已在既有道德意涵外，展現唐帝國更深層的精神面貌。

**關鍵詞：**動物報恩 大象報恩 象牙 朝貢 《廣異記》

# 帝國之眼：唐代「大象報恩」 故事新探

鄧郁生

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 一、前言

在唐代曾流行一種「大象報恩」故事，大抵描述某人替象解圍，象則贈牙回報。此類故事在《太平廣記》卷 441 中凡載有五，分別題作〈閩州莫徭〉（註出《廣異記》）、〈華容莊象〉（註出《朝野僉載》）、〈安南獵者〉（註出《廣異記》）、〈淮南獵者〉（註出《紀聞》）、〈蔣武〉（註出《傳奇》）。<sup>①</sup>檢視此五篇異文，咸具備「施救」及「報恩」兩項共同情節；而其之所以為人津津樂道，正在於動物非比尋常之人格化表現，以及人、獸之間令人熱血沸騰的情義。整體而言，五篇異文並置閱讀的結果委實傳達見義勇為、知恩圖報等道德內涵。

然若仔細觀察不難發現，除記述簡潔之〈華容莊象〉外，其餘四篇皆竭盡所能在敘事上筆補造化、曲盡其妙，如〈淮南獵者〉、〈安南獵者〉及〈蔣武〉便對獵夫射獸救象之過程刻畫再三；而〈閩州莫徭〉、〈安南獵者〉所敘象牙貿易

---

① （宋）李昉等編，汪紹楹校：《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卷441〈畜獸八〉，「象」類，頁3600-3603。此外，本文引述文字亦據（唐）張鷟撰，趙守儼點校：《朝野僉載》（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卷5，頁123。（唐）牛肅撰，李劍國輯校：《紀聞輯校》（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卷9，頁159-160。王夢鷗：《唐人小說研究：纂異記與傳奇校釋》（臺北：藝文印書館，1971年），頁158-159。以下五篇文本之引文皆出於此，除有必要者，不另作註。

與貢獻，則屬恩報情節外之增衍。此外，《太平廣記》所引〈蔣武〉僅敘至大象還恩，<sup>②</sup>其實原作猶有下文，乃云老虎同樣遭遇怪獸之苦而前來求救，但蔣武在得知老虎於村中「噬數百人」後，反而「回矢殞虎」，並將虎所奪釵釧歸還村民。<sup>③</sup>顯然在借鑑動物報恩故事之餘，猶欲藉象、虎二事之對照進一步闡明是非判斷，在情節構思上可謂別出心裁。<sup>④</sup>

由是，有必要重新思考唐人對大象報恩故事之接受方式，以及其在創作當下所浮現之認知轉移。不容否認，在「動物報恩」之視閥下，人與大象互助互惠之情誼格外鮮明；然若卸下恩義模式之加冕，將視角遷移至貿易、貢獻及斬除惡獸等作品中別費筆墨形容之情節，則其題材淵源與創變，以及受時代風氣所驅動之寫作思維，皆有待更進一步探索。詳言之，深具創作自覺的唐代文人在承繼大象報恩之相關知識與題材時，也努力開拓想像空間，爭相重寫故事；於是，大象報恩故事便宛如一場文學沙龍，提供作家表述來自生活經驗、社會文化之觀點與思維。<sup>⑤</sup>特別是故事結局隆重登場之「象牙」報償，以及隨之而來的政商敘事，毋乃投射出大唐帝國之物質欲望與權力機制。<sup>⑥</sup>易言之，此類故事之流行除題材與敘事

<sup>②</sup> 《太平廣記》作為類書，在採錄小說時或因分類標準而對原書材料有所取捨、刪改、加工和潤飾，不忠於原書之事例所在多有。參葉慶炳：《古典小說論評》（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5年），頁28-32。張國風：《《太平廣記》史話》（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年），頁95-99。

<sup>③</sup> 王夢鷗指出，〈蔣武〉於大象跪獻象牙後尚有老虎求救一段，其事雖僅見存曾慥《類說》，且刪略過當，但故事必為原作所有，非妄增也。衡諸《傳奇》書中篇章多曲折縈紆的情節設計，本篇亦當如是。（詳前揭書）周楞伽也有相同見解，參氏著：《裴劍傳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頁71。

<sup>④</sup> 裴劍《傳奇》擅於取鏡前人成果，如〈韋自東〉仿〈杜子春〉，〈蕭曠〉效〈柳毅傳〉，以及〈孫恪〉引用〈古鏡記〉典故等，並在模擬之餘不甘守舊，賦予小說新穎的創意設計。參程毅中：《唐代小說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頁264-265。

<sup>⑤</sup> 龔鵬程指出，中唐的「哲學突破」使唐傳奇指向探索人之處境，成為表露作家意緒之有意識創作；而作家們競用同一題材寫作的現象，乃展現一個時代之集體理想與價值觀。參氏著：《中國小說史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3年），頁195及217-220。

<sup>⑥</sup> 自古以來，象牙便為中國上層社會所珍愛，不僅可做出精美牙雕，並在朝貢體制裡扮演重要角色。而在唐代，朝廷對儀象、舞象及象笏之需求日益增大，並對象笏之官品及形制做出明確規

技巧水到渠成外，也與唐代象牙文化息息相關，物質需求的提升已使故事在原有道德內涵外蛻變出不一樣的觀看視角。

動物報恩故事在一般認知裡信為人、獸情誼之展現，然唐代大象報恩故事在承襲其敘事框架之餘，實已置入帝國的有色稜鏡，透射出不同的文化氣息與時代脈動。爰此，本文擬就上述五篇唐代文本展開討論，首先爬梳動物報恩故事之發展脈絡，進而考述作品之因襲與創新；其次則嘗試從物質文化及帝國政治之角度出發，重新認識唐代大象報恩故事之書寫特質。

## 二、唐代知識場域中的動物報恩故事

「動物報恩」是十分膾炙人口的民間故事類型，論者多謂中土此類作品源自佛經，反映果報思維，<sup>⑦</sup>此固有其道理，然二者實同中有別，一般而言，佛經文本強調好生之德，漢典則猶側重動物如何報恩，<sup>⑧</sup>體現出不同文化風貌。而在唐代知識場域中，緣於各種學問相互競逐、交融，知識份子對於動物報恩故事之承襲、引譬、創作、論說亦各有千秋，這不僅反映唐人信念與願望，更關涉到文化、政治等課題，與本文探討大象報恩故事之視角一脈相連。因此，在開展核心論題前，將先梳理漢典與佛經對動物報恩故事之認知，以建立相關背景知識。

### （一）漢典中相關題材之思索

西漢劉向《說苑·復恩》開宗明義云：「夫禽獸昆蟲猶知比假而相有報也，

---

範，兼以當時牙雕工藝趨於成熟，尤突顯象牙製品之珍貴。然因唐宋以降中原地區幾已無象可捕，因此獲取象牙之方式主要為海外貿易與朝貢。參陳宥任：《中國歷史上的象與象牙》（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6年），頁1-2、36、78及80。

<sup>⑦</sup> 如蔣述卓云，南北朝時由於果報思想盛行，遂使小說家在創作時可能襲用佛教故事，《搜神記》中孔愉放龜、董昭救蟻等事與《六度集經》理家放豎事、《雜寶藏經》沙彌救蟻事相仿，便是其例。參氏著：《佛經傳譯與中古文學思潮》（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會，2002年），頁35。

<sup>⑧</sup> 王立：《武俠文化通論續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頁279-280。

況於士君子之欲興名利於天下者乎？」<sup>9</sup>其託傳說中的古獸闡明君臣間相互報賞之倫理，是漢籍縱談動物報恩觀念較早之紀錄，惟明顯屬於儒家借題發揮的政治論述，動物僅作為事理之陪襯。嗣後佛法東傳，道教興起，戒殺、放生之說漸植人心，動物報恩故事由是蔚為風行。晉人干寶《搜神記》嘗輯錄不少相關傳聞，如隋侯療蛇傷而獲贈靈珠，楊寶救黃雀而有銜環之報，孫登治龍背疽而天降大雨，孔愉放龜而受蔭封侯，蘇易助牝虎生產而獲送野肉，董昭之救蟻王而解日後囹圄之難，俱為唐前著名事例；<sup>10</sup>另有《搜神後記》載毛寶帳下一士兵放龜，後於戰亂投江而不溺；<sup>11</sup>《異苑》記某農民為象拔足刺，象則掘地出數條象牙以贈之。<sup>12</sup>凡此數文，咸敘仁人醫護動物而得善報，從財寶、生計、祿位前途乃至攸關性命之事，動物俱能提供幫助，既彰顯人性之慈憫，亦體現人們對生活的某種渴望。

此類奇談隨著書籍之載錄與流行，亦成了唐人知識養成之一環，以「楊寶黃雀」為例，《蒙求》、《藝文類聚》、《白氏六帖》等士子涉獵學問之書皆嘗徵引其事，<sup>13</sup>對於唐代動物報恩故事之創作洵有一定影響力。考諸楊寶本事，始則敘其脫黃雀於梟、蟻之害，終則特書其子孫「四世名公」，潔白如玉環，<sup>14</sup>小小慈愛之舉竟換來無比顯赫殊榮，這對醉心仕途之唐人而言必然具有莫大吸引力。經考察，唐代動物報恩故事確有不少酬答豐厚之例，如《河東記·韋丹》寫救龜而得祿位，《傳奇·崔煒》敘救蛇而得寶珠和重金，皆與唐前作品一脈相承；至若〈柳

<sup>9</sup> 左松超：《說苑集證》（臺北：國立編譯館，2001年），卷6，頁299。

<sup>10</sup> （晉）干寶著，汪紹楹校注：《搜神記》（臺北：里仁書局，1999年），卷20。其中，隋侯、楊寶、董昭之諸事乃屬於AT554「感恩的動物」型故事，而蘇易助孕虎則屬於AT156B\*「女人做蛇的助產士」型故事。

<sup>11</sup> 王國良：《搜神後記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8年），頁121。

<sup>12</sup> 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說輯釋》（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頁504。

<sup>13</sup> 《蒙求》「楊生黃雀，毛子白龜」條，見（唐）李翰：《蒙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山西應縣佛官寺所藏遼刻本），頁158；（唐）歐陽詢：《藝文類聚》（京都：中文出版社，1980年），卷92「鳥部下」，「雀」類引《續齊諧記》，頁1595；（唐）白居易：《白氏六帖》（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江安傅氏藏本），卷29「雀」類，「銜環」條引《後漢書》，頁2200。

<sup>14</sup> 王國良：《續齊諧記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頁26-27。

毅傳)更有娶龍女、享富貴、登仙班之福報，唐人對報酬內容之無窮想望可見一斑。

除濃厚之欲望書寫外，唐人對動物報恩故事的態度明顯以人為本位，許多文章之用典或引譬，皆有意託動物而言人事，如崔祐甫〈上宰相牋〉：「況祐甫當遺簪墜履之列，懷救蛇養雀之惠，雖報恩之分，誓以終身。」<sup>15</sup>李商隱〈謝座主魏相公啓〉：「孔龜效印，未議於酬恩；楊雀銜環，徒聞於報惠。」<sup>16</sup>咸為取譬以自況。又《宣室志》卷3「李氏子」條記老鼠報恩事，文末有云：

悲夫！鼠固微物也，尚能識恩而知報，況人乎？如是則施恩者宜廣其恩，而報恩者亦宜竭其誠。有不顧者，當視此以愧。<sup>17</sup>

同樣未脫借物喻人的思維模式。另值注意者，在政治家眼中，動物報恩之事猶可作為勸喻亂臣賊子、化外之邦的「貶抑性」修辭，如唐肅宗下令誅斬達奚珣等叛臣之詔文云：「龜蛇蠱動之類，皆能報恩。豈曰人臣，曾無感激？」<sup>18</sup>牛叢〈責南詔蠻書〉：「且蛇雀犬馬，猶能報德，王乃不如蟲鳥乎？」（《全唐文》，卷827，頁3863）均藉以告諭王土之下的君臣之禮。這些暗含權力競逐之論述，殆上承《說苑·復恩》所揭櫫之儒家倫理，此類事典亦因之在唐代知識場域中染上鮮明的政治色彩。

## （二）佛經中相關題材之思索

自六朝以來，佛教僧侶傳教、譯經之風昌熾，因果報應、有情眾生之說日益

<sup>15</sup>（清）董誥主編：《全唐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卷409，頁1855。下引其書徑誌卷次、頁碼。

<sup>16</sup>（宋）李昉主編：《文苑英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年），卷653〈啟三·謝官〉，頁3356。下引其書徑誌卷次、頁碼。

<sup>17</sup>（唐）張讀撰，蕭逸校點：《宣室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21。《太平廣記》卷440亦收此事，題作〈李甲〉。

<sup>18</sup>（宋）王欽若、楊億主編：《冊府元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文淵閣四庫本），卷152〈帝王部明罰〉，頁687。下引其書徑誌卷次、頁碼。

滲透東土，而動物報恩故事亦隨之廣為流佈，當時許多闡述佛陀本生或因緣之漢譯佛經皆嘗收錄其事，如吳人康僧會譯《六度集經》卷3〈理家本生〉、卷5〈難王本生〉等，<sup>19</sup>俱言菩薩前世曾施濟動物與某人，爾後獲動物報恩，但某人卻因起私心而恩將仇報，最終落得悲慘下場，乃屬於 AT160「感恩的動物；忘恩的人」型故事。<sup>20</sup>究其旨趣則在教人憐憫眾生、積善得福，並撻伐貪利、寡恩之人性，以示警惕。<sup>21</sup>彼等福禍因果之說誠具深刻勸懲意味，使閱聽者於感悟之際能更修德持戒，此為佛經故事講述本意當無疑義。

至於佛經故事對中國小說之影響，前賢多有揭示，如魯迅云：「魏晉以來，漸譯釋典，天竺故事亦流傳世間，文人喜其穎異，於有意或無意中用之，遂蛻化為國有。」<sup>22</sup>就動物報恩故事而言，唐人小說中亦有一些可能因襲佛經之例，如《廣異記·劉彥回》敘劉某昔曾放龜，後十餘年洪水泛溢，其子劉彥回遇大龜相助而得免水難，便與上述《六度集經》所載理家放鼈事相侔；所不同者，〈劉彥回〉因強調劉父積善而福蔭子孫，遂使故事驟止於烏龜報恩，而未有佛經後半「忘恩人」情節。<sup>23</sup>又《稽神錄·宋氏》記宋氏因放龜而使其子得免風濤之害，亦與前例機杼相似；而《宣室志》卷4「劉成、李暉」條敘放魚得錢事，乃起於劉成聞舫中群魚呼「阿彌陀佛」，則為小說融入佛法之鮮明事例。

<sup>19</sup> (吳)康僧會譯：《六度集經》(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年，《大正新修大藏經·本緣部上》)，頁15-16及28。另，《經律異相》卷11之〈為大理家身濟鼈及蛇狐〉、卷26之〈日難王棄國學道濟三種命〉、卷44之〈慈羅放鼈後遇大水還濟其命〉與此二事相似，可參看。又，《雜寶藏經》卷4之〈沙彌救蟻子水災得長命報緣〉亦似之，但無「忘恩人」情節。

<sup>20</sup> (美)丁乃通：《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索引》(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23。

<sup>21</sup> 劉守華認為，佛經中此類故事反映當時社會因私有制發展所呈現之道德墮落，凝聚著佛教徒激濁揚清之願望。參氏著：《佛經故事與中國民間故事演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238。

<sup>22</sup> 魯迅：《魯迅小說史論文集：中國小說史略及其他》(臺北：里仁書局，1992年)，頁42。佛經故事經僧人翻譯與宣講，實已滲透民間。志怪小說藉「口承」之途徑取鏡佛經故事，一者由僧人講述，一者為源自佛經而幾經變易的民間傳聞，魯迅所謂「無意間用之」蓋指後者。

<sup>23</sup> 劉惠卿云，佛經中此類故事往往夾雜著負心人與感恩動物之對比，而六朝小說則僅有動物報恩之描寫。參氏著：《佛經文學與六朝小說母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頁131。其推論乃就「毛寶白龜」等六朝志怪而言，然借以審視〈劉彥回〉等唐人小說亦然。

事實上，唐代文人經常出入寺院，有機會閱覽《六度集經》、《經律異相》等佛經，又或聽聞相關故事，在創作之際吸取其中題材亦是極其自然之事。<sup>24</sup>此外，卷帙浩繁的佛教文獻能夠廣為傳播、融入中土，盛唐高僧道世、辯機所編撰之《法苑珠林》、《大唐西域記》等類書或風土記實扮演極重要推手。<sup>25</sup>《法苑珠林》卷50〈報恩篇〉便有收錄上述《六度集經》理家放鼈事，大大增加其能見度。此不僅有助於故事保存與流行，分門別類的纂集方式亦使之成為唐人讀取創作之資的知識平台。與此同時，釋門亦藉此平台表述其對動物報恩故事之立場，《法苑珠林》卷65〈放生篇〉有云：

至如楊生養雀，寧有意於玉環？孔氏放龜，本無情於金印。而冥期弗爽，雅報斯臻。……且大悲之化，救苦為端。弘誓之心，濟生為本。……群生何罪？枉見刑殘。……今勸仁者，同修慈行。所有危怖，並存放捨，縱彼飛沈，隨其飲啄。當使紫鱗頰尾，並相忘於江湖，錦臆翠毛，等逍遙於雲漢。<sup>26</sup>

編者引述楊寶、孔愉等中土事典，固有意化解佛經予人之陌生感，唯其明顯側重長養善心及安頓萬物生命，進而於後文學善惡報應事例，強調護生、戒殺之重要，

<sup>24</sup> 夏廣興指出，唐代小說家如唐臨、牛肅、李公佐、段成式等，或為釋子，或於寺院讀書，或與僧人交遊往來，或參與寺院俗唱、講經等活動，作為書面或口傳之佛經故事自然成為寫作材料。參氏著：〈隋唐五代小說採摭佛典題材探微〉，收於陳允吉主編：《佛經文學研究論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442-443。

<sup>25</sup> 孫鴻亮：《佛經敘事文學與唐代小說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121-149。其認為《法苑珠林》融合佛經與中土文獻之編輯體例乃有助於消弭中印文化之隔閡，並使佛經故事本土化。而《大唐西域記》所採錄之印度民間傳聞如〈烈士池〉，嘗為《玄怪錄·杜子春》、《酉陽雜俎·顧玄績》等所取材，足證其說。

<sup>26</sup> （唐）釋道世著，周叔迦、蘇晉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1943-1944。相似論述尚見是書卷73〈十惡篇〉，「殺生部」，頁2165：「楊寶施華，便致白環之報。……豈容縱此無厭，供斯有待；斷他氣命，絕彼陰身？」又卷64〈漁獵篇〉亦倡戒殺，闡示慈悲之道以救拔眾生，可參看。



與講究報償及人倫思考之中土小說自是多有不同。換言之，在唐代知識場域中，佛經引述動物報恩故事乃以慈悲為念，意欲透過道德勸懲渡化有情眾生；而漢典則將敘事重心從救護動物偏移至福澤豐厚之結局，又或者著眼於人事利弊的省思。此正可解釋為何佛經故事每在敘述「感恩動物」之後，猶欲鋪張「忘恩人」之為惡受報；而〈劉彥回〉等中土小說則屢於獲得動物回報後便戛然而止，留予讀者細細品味其靡麗厚酬。

### 三、唐代大象報恩故事之題材淵源與創變

賡續上述，唐代大象報恩故事亦與佛經題材有著千絲萬縷之關係，<sup>27</sup>但在承繼之餘又孳乳出具中土色彩之創新。本節將嘗試分析其情節嬗變與素材來源，並嘗試對比前述漢典、佛經之文本，思索其報恩情節之變易是否符合大象習性，進而一窺故事背後所潛藏之欲望世界。

#### （一）從「拔刺」到「除獸」之情節嬗變

先論〈華容莊象〉與〈閩州莫徭〉，二文皆敘某人為象拔足刺，錢鍾書嘗將之聯繫《異苑》及《大唐西域記》所載異文，彰顯其相似性。<sup>28</sup>事實上，此類故事或源自印度民間，公元前三世紀，以巴利文寫成之《佛本生故事》<sup>29</sup>便有相類傳

<sup>27</sup> 據孫鴻亮之考究與整理，嘗蒐錄、改寫佛經故事之唐人小說計有：《冥報記》、《紀聞》、《朝野僉載》、《廣異記》、《玄怪錄》、《續玄怪錄》、《河東記》、《酉陽雜俎》、《宣室志》、《傳奇》、《三水小牘》等。見孫鴻亮：《佛經敘事文學與唐代小說研究》，頁153-209。記述大象報恩故事之小說專集皆在其列，足見其與佛經之淵源。

<sup>28</sup> 錢鍾書：《管錘編》第2冊（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1990年），頁819-820。另，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說輯釋》，頁505、程毅中：《唐代小說史》，頁63-64、劉守華：《中國民間故事史》（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頁132及189，皆有相同見解，可參看。

<sup>29</sup> 巴利文《佛本生故事》（或譯作《本生經》）作者不詳，殆為佛教徒蒐集當時民間傳說而附會為釋尊前世修行之故事，共計五百多則。這些故事隨著佛教之傳佈，亦開始在錫蘭、西域、東南亞等地流行，東晉高僧法顯西行求法時，便曾在錫蘭供養佛牙之遊行中見過「菩薩五百身」故事。參季羨林：〈關於巴利文《佛本生故事》〉，《比較文學與民間文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頁123-126。

聞；<sup>30</sup>而《大唐西域記》所載大象求醫故事亦為玄奘天竺行腳之採錄，可見其事與印度民譚淵源極深。換言之，此類故事殆隨佛教東傳而入中土，或憑書承，或以口承，漸次蛻化為小說裡的故事。<sup>31</sup>

夏廣興主張，《大唐西域記》在唐時頗有影響力，是〈華容莊象〉與〈閩州莫徭〉之題材來源，對於開啓創作風氣洵有其功。<sup>32</sup>而更重要者，「拔刺報恩」故事在唐代知識場域中確實佔有一席之地，舉凡《廣異記·張魚舟》、《劉賓客嘉話錄·傷虎報恩》、《錄異記·李大可》、《神仙拾遺·郭文》等，咸敘某人為虎拔刺，虎則屢銜野味以謝其恩，與前述大象文本同屬 AT156「獅爪上拔刺」型故事無疑。<sup>33</sup>凡此數文風采各異，既見講述者之創意發想，亦知唐人對此類故事之熟稔與愛好。其中，〈傷虎報恩〉記劉禹錫云：「有一話，曾有老嫗山行見大蟲。」<sup>34</sup>誠帶有濃厚的民譚氣息。〈郭文〉所敘為虎去喉中骨事，則或本諸《六度集經》卷5〈雀王經〉，<sup>35</sup>見證唐時仙傳與佛經之交融。由是可知，在唐代宗教著

<sup>30</sup> 大象報恩之本生故事詳見悟醒譯：《本生經》第156則〈無私心本生譚〉，「CBETA Online」(<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上網檢索日期：2021年12月19日。）至若其事與中國小說之關係，可參王立：《武俠文化通論續編》，頁277。蔡苡：〈「拔刺報恩」故事的印度淵源與發展演變〉，《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03期（2017年），頁42-44。

<sup>31</sup> 陳寅恪云：「或雖經譯出，而書籍亡逸，無可徵考。或雖未譯出，而此故事僅憑口述，亦得輾轉流傳至於中土。」見氏著：〈三國志曹沖華佗傳與佛教故事〉，《陳寅恪集·寒柳堂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頁177。《異苑》「大客」條殆如《續齊諧記》「鵝籠書生」事，同為與佛經有淵源之六朝小說，代表佛經漢化之先河。

<sup>32</sup> 夏廣興：〈隋唐五代小說採摭佛典題材探微〉，頁452。鄭振鐸嘗據《酉陽雜俎》「貶誤」所載杜子春故事之源流，認為《大唐西域記》在唐代文人圈中起著極大作用。參氏著：《鄭振鐸古典文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765。

<sup>33</sup> （美）丁乃通：《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索引》，頁21。上述象、虎拔刺報恩事例俱見此型號中。

<sup>34</sup> 羅聯添：〈劉賓客嘉話錄校補及考證〉，《唐代文學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年），頁737。

<sup>35</sup> 夏廣興：〈隋唐五代小說採摭佛典題材探微〉，頁453-454。其指出，佛經該類故事之獅、虎皆為忘恩獸，〈郭文〉在承襲之餘則改易為報恩，以突顯知恩圖報的美德。案：〈雀王經〉所敘啄骨、背義事亦收錄於《經律異相》卷11、《法苑珠林》卷51，為佛經熟典。其事當屬 AT76「狼和鶴」型故事，乃著眼於負面題材之道德教誨，原固未涉報恩情節。〈郭文〉之改寫除強調報恩外，猶欲藉虎之馴隨左右申論「理民」之術，此一政論結尾與前述漢典相關題材之思索實一脈相承。〈郭文〉本事詳《太平廣記》卷14，「神仙十四」，註出《神仙拾遺》。

述、文人創作及民間口傳中，「拔刺報恩」都是十分熾盛的一種故事類型；然顯而易見者，唐人小說中求助拔刺的動物多為老虎，成為此類故事流行中土之一大特色。

至若〈淮南獵者〉、〈安南獵者〉、〈蔣武〉三篇，觀其救象方式為「殺怪獸」，與前述「拔足刺」事例迥然有別，可視作唐代大象報恩故事之重要創變。茲以〈淮南獵者〉為例，其文云：

俄而有一青獸，自松樹南細草中出，毳毛鬚鬚，爪牙可畏。其大如屋，電目雷音，來止磐石，若有所待。有頃，一次象自北而來，遙見猛獸，俯伏膝行。既至磐石，恐懼戰慄。獸見之喜，以手取之，投於空中。……（獵夫）縱毒箭射之，洞其左腋。獸既中箭，來趨獵夫，又迎射貫心，獸踣焉，宛轉而死。

文中對於怪獸啗象及勇者射獸之過程均寫得十分曲折生動，宛若一篇英雄史詩，彰顯出唐人作意好奇、踵事增華之筆力。〈安南獵者〉的描述與之相似，此不贅述。〈蔣武〉則將怪獸設定為已吞數百頭大象之「巴蛇」，並增設一能言之猩猩與獵夫溝通，可謂別出心裁。簡言之，此三篇大象報恩故事誠已跳脫簡單的「拔刺」情節，改以「除獸」作為施恩方式。這不僅讓小說敘事變得更加跌宕多姿，有利作者擴其波瀾；同時因拯救的是整個象族，遂使故事最後的象牙報償特顯貴重。

## （二）吞象「怪獸」之原型蠹測

經上文爬梳可知，「拔刺」為大象報恩故事較為原始之敘事型態，與佛經淵源極深；而「除獸」則為中土文士雅好之故事情節，是其施展文采與意想之筆耕園地。二者最大不同在於後者增設一欺侮大象之怪獸，使故事染上「鋤強扶弱」之色彩。此一構想並非作者獨見，在中土動物報恩故事中，唐人所熟悉之「楊寶黃雀」已初見端倪，又如《廣異記·海州獵人》之助黑蛇殺巨蛇，《傳奇·姚坤》、《瀟湘錄·周義》之脫狐、虎於獵網，均以第三方之危害增添戲劇張力，

唯對加害者之描摹皆未如〈淮南獵者〉等文藻繪之深。是知，唐代大象報恩故事在運用「鋤強扶弱」之敘事模式時，對於第三方角色之選擇與形塑實有其用心之處。

眾所周知，大象為陸地上最大型的哺乳動物，故在一般認知中，能吞噬大象之動物微乎其微。〈淮南獵者〉「大如屋」之青獸，〈安南獵者〉「高十餘丈」之巨獸，以及〈蔣武〉「長數百尺」之巴蛇，咸以其壓倒性實力玩弄大象於股掌之間，是皆小說之奇幻設想，帶有濃厚的夸誕成份。唯此想像恐非文人向壁虛造，而當有文獻材料或生物原型作為描摹依據。最明顯者即〈蔣武〉中的巴蛇，是文言其「電光而閃其目，劍刃而利其牙，象之經過，咸被吞噬」，以致「象骨與牙，其積如山」，恐怖程度不亞於前述青獸與巨獸。其原型則當源自《山海經·海內南經》：「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sup>36</sup>《藝文類聚》卷 95 之「象類」亦引其說，殆為唐人熟典無疑。而裴鏞在〈蔣武〉中化用其事，不僅特予增飾渲染，並在文學典故之召喚、複讀下，成功說服知聞巴蛇傳說的讀者，向其殷切訴說大象極待救援的處境。

需稍作推敲者為〈淮南獵者〉、〈安南獵者〉中的怪獸，觀其「毳毛鬚鬚」、「電目雷音」、「聲震林木」之形象，極可能摹創自獅子。獅子原為域外動物，中土人士親睹其身影之機會不多，然漢譯佛經多有相關記載，如《經律異相》卷 47 形容云：

當知真師子王，晨朝出穴，嚙申欠呿，四向顧視，發聲震吼。……凡聞師子吼，水住深潛，陸行藏穴，高飛墮落。厩中香象，振鎖斷絕，失糞怖走。……一切畜生。師子為最。<sup>37</sup>

<sup>36</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82年），頁 281。

<sup>37</sup> （梁）寶唱：《經律異相》（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年，《大正新修大藏經·事彙部上》），卷 47「雜獸畜生部上」，「師子」類，〈師子王有十一勝事〉條節引《涅槃經》并《大智度論》，頁 244。

其描述獅子吼所展現之莫大威勢，連大象亦驚恐而退避三舍，故有百獸之王稱號。是書同卷又載〈師子食象哽死木雀爲拔得蘇後遂忘恩〉，與前述〈雀王經〉情節相俾，亦知在佛典之想像世界中，獅子誠具備噬象能力。此一說法隨佛教傳佈而漸爲中土文人習知，如六朝王琰《冥祥記》「曇無竭」條云：「有師子從林中出，象驚奔走」。<sup>38</sup>唐代類書《初學記》引宋炳〈師子擊象圖序〉曰：「忽聞數十里外哮哮濼濼，驚天怖地，頃之，見百獸率走，蹠地足絕。……俄有師子三頭搏象，血若濫泉，巨樹草偃。」<sup>39</sup>另有虞世南〈獅子賦〉：「瞋目電曜，發聲雷響。拉虎吞貔，裂犀分象。」（《文苑英華》，卷 131，頁 601）張九齡〈獅子贊序〉：「眈視且瞋，則百獸皆伏。所以肉視犀象，孩撫熊羆。」（《全唐文》，卷 290，頁 1303）殆於唐時，藉由知識傳播，獅子吼聲如雷、能剋殺大象之威勢已烙印爲一種認知。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淮南獵者〉、〈安南獵者〉二文之怪獸原型殆爲上述知識場域中被視作獸王的獅子。

### （三）報恩方式之變易

關於故事結局的報恩方式，唐代五篇異文明顯與佛經版本涇渭不同。如前所述，大象報恩故事乃脫胎自印度民譚，印度古民好馴化大象來馱物、騎乘或協助戰事，故佛經中有佛陀禁食象肉之記載。<sup>40</sup>觀《佛本生故事》、《大唐西域記》所述象報恩方式：助人幹活、禦敵或餽贈佛牙，當係印度象文化於宗教故事之投射。至若中土故事之大象報恩方式則爲酬送象牙，往往敘其引領恩人至一秘處掘出象牙，使得牙者大獲資財；這些作品不厭其煩地歌頌象牙之珍貴，較諸借重大象勞

<sup>38</sup> 王國良：《冥祥記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下編：輯佚校釋〉，頁 175。

<sup>39</sup> （唐）徐堅編：《初學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文淵閣四庫本），卷 29〈獸部〉，「師子」類，「擊象」條引，頁 461。另，此書獸部之排序採「師子第一，象第二」，與《經律異相》之「雜獸畜生部」作法一致，當有因襲關係；這對熟知佛典之文人如牛肅、戴孚而言，誠建立了獅、象高下等第之認知，對於構想作品中欺侮大象之怪獸，不無推波助瀾之可能。

<sup>40</sup> 關於古印度象文化詳吳海勇：《中古漢譯佛經敘事文學研究》（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會，2002年），頁 140-148。

力的佛經異文已有雲泥之別。此一重要創變既與前述漢典之動物報恩故事一脈相承，亦鏡像出唐人對象牙之渴求。

綜覽報恩故事之酬報方式如龍降雨、龜救溺、虎銜肉、蟻齧械等，多賴動物發揮自身特長，佛經事例中大象協助馱運亦爲此儔；即如蛇珠、雀環者，雖已摻入人類主觀想望，然亦尚在情理之中。獨中土故事之大象既非出動勞力或採集蔬果，亦非饋贈其它貴重珠寶，而乃捐獻象族遺骨中的象牙，對比前述把握動物習性之事例實顯突兀。據《初學記》卷 29 引萬震《南州異物志》云：

俗傳象牙歲脫，猶愛惜之，掘地而藏之。人欲取，當作假牙潛往易之，覺則不藏故處。<sup>41</sup>

大象藏牙、惜牙之生物習性，古人誠已知之，〈淮南獵者〉等文所言密林中藏有象牙之情節恰符其說；然群象掘地「出所藏之牙」云云，則恐非其原有物性。尤甚者，〈安南獵者〉中群象爲答謝獵者大恩，竟將藏牙之處公諸於人：

象載人前行，群象從之。尋至一所，植木如隴，大象以鼻揭楂，群象皆揭，日旰而盡，中有象牙數萬枚。象載人行，數十步內，必披一枝，蓋示其路。訖，尋至昨寐之處，下人於地，再拜而去。其人歸白都護，都護發使隨之，得牙數萬，嶺表牙爲之賤。

大象細心地「披枝示路」，以助恩人尋向所誌、取得數萬枚象牙，若對照萬震所記大象習性，不免感到齟齬。而「大量回饋」之結局看似和諧美好，仍帶有人們之主觀願望，在現實中畢竟是天方夜譚。換言之，唐代此類故事不惜違背大象習性，將酬報方式由勞力轉爲贈牙，目的無非爲滿足人們更高層次的物質欲望。這點，將於下節詳述。

<sup>41</sup> (唐) 徐堅編：《初學記》，卷 29 〈獸部〉，「象」類，頁 462。同卷又引沈懷遠《南越志》曰：「象牙長一丈餘，脫其牙則深藏之。」同證其事。

## 四、物質文化視閥下之故事解讀

英國漢學家伊懋可（Mark Elvin）指出，中國人與大象間三千年的搏鬥主要表現在開墾森林、保護庄稼及獵取象牙等，大象數量之不斷縮減及向南方退卻，實反映中國經濟活動及物質文明之發展。<sup>42</sup>大象報恩故事所歌詠「人、象相互濟助」之情義，雖與伊懋可所持「人、象相互消長」之觀點判若鴻溝；然故事地點多設為西南或南方，以及故事尾巴所流露之物質欲望，卻與伊氏說法若相符節。換言之，在搬演報恩佳話的舞台上，其實隱含若干物欲橫流的心理真實。<sup>43</sup>以下試從唐人對象牙的文化認知切入，放大檢視大象報恩故事裡的欲望鏡像。

### （一）唐人對象牙的文化認知

張潔認為，佩戴象牙製品在漢代已是一種身分象徵，至唐代，象笏、象輅更在官僚體系中受到普遍使用，成為區分階級之器物，<sup>44</sup>富貴之家亦好用象牙製品，以襯顯其尊崇。此一器物習尚在文教廣化下，漸次成為人們根深蒂固的觀念。如唐代士子所熟讀之《昭明文選》及《玉臺新詠》，便屢見前人藉象牙形容貴族生活之豪奢，司馬相如〈上林賦〉：「天子校獵，乘鏤象。」<sup>45</sup>梁簡文帝〈變童〉：「翠被含鴛色，雕牀鏤象牙。」<sup>46</sup>皆為是例。而《藝文類聚》等類書所載關於象牙

<sup>42</sup>（英）伊懋可（Mark Elvin）著，梅雪芹等譯：《大象的退卻：一部中國環境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年），頁10-20。

<sup>43</sup>文學作品如同白日夢，是種經過偽裝的隱密行動，欲望之線輒貫穿其中。富想像力之作品提供給我們的享受，蓋為精神緊張的解除，那是一種無需自責的欲望滿足。參（美）Elizabeth Freund著，陳燕谷譯：《讀者反應理論批評》（臺北：駱駝出版社，1994年），頁111-113。依此而言，在現實裡緊張的人、象關係，卻在動物報恩故事之包裝下轉為和諧，此一幻設之動力正是唐人對象牙之渴求。

<sup>44</sup>張潔：〈論中國古代的象牙製品及其文化功能〉，《中州學刊》05期（2009年），頁193。

<sup>45</sup>（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臺北：五南圖書公司，1991年），卷8〈賦丁·畋獵中〉，頁204。句下注云：「以象牙疏鏤其車輅。」

<sup>46</sup>（陳）徐陵：《玉臺新詠》（臺北：世界書局，1971年），卷7，頁47。

之編事，更於蒐典、立類之際散發濃厚的器用美學，試將其所屬部類表列如下：

《藝文類聚》	《北堂書鈔》	《初學記》
簫（卷 44「樂部」）		簫（卷 16「樂部」）
筆（卷 58「雜文部」）	筆（卷 104「藝文部」）	筆（卷 21「文部」）
弓（卷 60「軍器部」）		鞭（卷 22「武部」）
簾（卷 69「服飾部」）	簾、牀、簟、席、扇、熏籠、梳（卷 132~136「儀飾部」）	帷幕、簾、牀、扇（卷 25「器用部」）
圍棊、彈棊、樗蒲（卷 74「巧藝部」）		

借助以上爬梳，實可輕易勾沉出一部「象牙珍玩史」。另據陳宥任考察，中國之象牙雕鏤技術發展至唐已臻成熟，透過撥鏤染色之新工法，象牙被製成各式各樣的手工精品，使原先已十分珍貴之象牙再增添其藝術價值。<sup>47</sup>對照上表所列類門，諸如樂器、文具、博弈、傢俱及武器等物，莫不以象牙為飾作材，宛若一座博物館，琳瑯滿目的象牙製器盡收眼底。這些類書徵引唐前典籍，誠共同輻輳出古人對牙雕製品之愛好，並在隸事用典之創作風氣推波助瀾下，習染唐人的象牙認知，象牙製器遂為文學作品裡表述榮華與排場的常見符號。《朝野僉載》記張易之為母造七寶帳，「鋪象牙床，織犀角簟、麗貂之褥、蛩蟲之氈」。（卷 3，頁 69）《玄怪錄·劉諷》敘女仙之宴「坐中設犀角酒樽、象牙杓、綠鬪花罈、白琉璃盞」。<sup>48</sup>凡此皆與文化認知一脈相承，並隨著文學作品反覆陳說，深化象牙在社會階層裡的上流屬性。

與此同時，《藝文類聚》、《初學記》猶設有「象」類，所收事典包羅生物知識、異域風情、文化交流等面向，誠可一窺古人對大象之基本認知。其中，涉及象牙者為《左傳》「象有齒，以焚其身」一語，<sup>49</sup>原為子產勸曉范宣子輕財遠禍之引譬，唐人因襲此說者如吳筠〈玄猿賦〉：「小則翡翠殞於羽毛，大則犀象殘

<sup>47</sup> 陳宥任：《中國歷史上的象與象牙》，頁 38-39。

<sup>48</sup> （唐）牛僧孺撰，程毅中點校：《玄怪錄》（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卷 6，頁 53。

<sup>49</sup> 原事見《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收於《初學記》卷 29 及《藝文類聚》卷 95。



於齒革。」（《文苑英華》，卷 134，頁 619）李子仃〈傷斃犬賦〉：「原夫萬物莫不以智遇禍，以材喪身，象以其齒，龜以其神。」（《文苑英華》，卷 134，頁 619）皆有教人韜光養晦之意。唯在借物喻人之修辭過程裡，實亦透露象牙很早就已被商品化，大象之遭獵殺其來有自。其間或閃現對生命逝去之些許同情，然此憐憫之情因與唐人獲取象牙之物質主義格格不入，並未在知識場域裡形成主流論述。

## （二）大象報恩故事裡的欲望鏡像

承上所述，在物質文化視闕下，唐代大象報恩故事誠有其特殊語境。其屢於結尾處烘染象牙價值，鋪張得牙者一夕致富，所獲之利令人嘆為觀止。其中，〈閩州莫徭〉尤以泰半筆墨託「胡人識寶」<sup>50</sup>之事云：「牙中有二龍，相躩而立，可絕為簡，本國重此者以為貨，當值數十萬萬，得之為大商賈矣。」旋而又敘此事驚動朝廷，「天后命剖牙，果得龍簡」，彰顯其價值連城。作者如此細膩琢磨象牙之寶物形象，幾乎轉移了報恩故事之焦點，唐人對於象牙之欣賞與欲望在此展露無遺。換言之，此類故事固於表面上刻劃施助與報恩，然究其深層鏡像，貼在象牙之上的物欲標籤實顯而易見。

其它篇章雖未如〈閩州莫徭〉般特費筆力勾描象牙價值，但多不忘交代象牙所帶來的巨額報償。如〈安南獵者〉、〈淮南獵者〉即分別以數萬枚、三百餘莖象牙使人獲得龐大利益。〈蔣武〉則寫大象跪獻紅牙而「武乃大有資產」，旋又另敘老虎持金釧前來求助；與文章前半救象之事不同，查明真相的蔣武選擇殺虎為民除害，金釧歸民而「一無所取」。刻劃蔣武對不義之財的拒斥，誠有意突顯其人明辨是非之形象，在承衍大象報恩故事之餘，乃嘗試將所欲反思之課題導向人事，一如前述「象齒焚身」之修辭屬性，咸為託物喻人之表現。簡言之，作者對於財物之取捨誠有其道德反省，唯透過象、虎二事之對照，不難發現此一道德

<sup>50</sup> 程蕃歸納唐代此類傳說最常見之內容為：某人因故得寶，但不諳其價值，胡人識之而出重金買之，並說明此寶名稱及用途。另有兩類變易，分別屢入胡人報恩贈寶、某人無意間毀損寶物等情節。詳氏著：《中國識寶傳說研究》（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年），頁 74-75。

反省僅止於人，至於作為報償的象牙，緣於物質文化不假思索的預設，便在〈蔣武〉中理所當然地成為人們可以接受的「財物」。

再就故事地點而論，〈安南獵者〉謂都護將安南（今北越）所獲象牙載歸，以致「嶺表牙賤」。這不僅道出唐代象牙來源已南拓至中南半島，<sup>51</sup>同時亦點出嶺南為當時重要之象牙集散地。無獨有偶，〈蔣武〉敘循州（今廣東）人蔣武救象，而象捲「紅牙」回報，同樣以嶺南為故事地點。此絕非單純巧合，據劉恂《嶺表錄異》云：「廣之屬郡潮、循州多野象，牙小而紅，最堪作笏。」（《太平廣記》，卷 441，頁 3604）因此，〈安南獵者〉、〈蔣武〉之地點選擇確為唐人物產知識的具體投射，並反映大象棲地「向南退卻」之事實。唯邊地異族多賴象以耕樵，「負重致遠，如中夏之畜牛馬」，<sup>52</sup>象牙並非其需求。因此嚴格說來，此類故事之陳述宜屬外來者視角，毋乃唐王朝在中原幾已無象可捕之現實侷限下，將欲望觸手伸至邊地的結果。

一如伊懋可所言，歷史事實是，中國長期以來的文化發展使其大量獵象取牙，然亦逐漸面臨無象可捕、象牙匱乏之困境。《西陽雜俎》嘗載南方獵者「裹糧登高樹，構熊巢伺之」，候數日而潛殺野象，<sup>53</sup>即道出唐人捕象之艱苦。而在文學想像裡，〈淮南獵者〉、〈安南獵者〉亦敘獵夫緣樹登木，唯伺機射殺之對象為虛擬怪獸。其故事地點多設於深山大澤，百里之遙，森然隱天，非常人所能輕易到達（故多由象馱之）。於是在獲取象牙前，主人公皆須歷經一場越界森林的冒險，噬象之獸的出現尤突顯此趟榛莽之旅的危險，標誌著象牙得來不易。反過來說，正是基於對資源匱乏的恐懼心理，方將之轉嫁予具像的、可憑箭矢鏟除之怪獸。

<sup>51</sup> 據美國漢學家薛愛華（Edward Hetszel Schafer）之考察，定期進貢唐朝之象牙，絕多數來自安南驩州，進而在北方工匠手裡製成篋、簪、梳、琴拔、制尺、手板等精美工藝品。參氏著，程章燦等譯：《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頁 453。

<sup>52</sup> 《太平廣記》，卷 441 引《嶺表錄異》，頁 3604。又《西陽雜俎》言環王國（今中越）馴象「可令代樵」。見（唐）段成式：《西陽雜俎》（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3年），續集卷 8〈支動〉，頁 276。《蠻書》則記巴南人捉象「養之以代耕田」。見（唐）樊綽：《蠻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年，琳琅秘室叢書本），卷 7〈雲南管內物產〉，頁 6。

<sup>53</sup> （唐）段成式：《西陽雜俎》，卷 16〈廣動植之一〉，頁 158。

易言之，象牙既為唐人渴盼又難得之珍品，則此類故事乃本於進入未知叢林的焦慮，以及對獲取象牙的不確定感，遂借助冒險犯難之俠義敘事設想出人、象之共同敵人，再以助象退敵、獲取象牙之情節，形成與大象共生共存的混同想像。

職是，當我們以物質文化視角重新審視唐代大象報恩故事，殆由於象牙取得不易、彌足珍貴，故而將大象符號化為迷人的受害者，並透過救助與報恩之文學想像來滿足人們的象牙渴望。〈淮南獵者〉等文更回頭召喚典籍中的怪獸，利用其摧枯拉朽的吞象能力，烘托大象楚楚可憐的弱勢形象，再由人類扮演正義使者鏟除怪獸，解救遭難的大象。由是，獵者與大象便在情感或利益上結為同一陣線，在同仇敵愾之氣氛下促進彼此凝聚。此一「人—獸—象」之三角關係端的鞏固人類獲取象牙的正當性，於是，大象此一現實脈絡中頻遭獵殺的受害者遂蛻變為報恩者，以合理化人類對象牙的剝取；至於故事裡虛構的怪獸，則成了擔負殺戮之名的劊子手。在講述者有意無意間，文明的暴力悄然被隱匿，取而代之的是獲牙者大獲資財的物質化結局；而原先怪獸食象、滿地屍骨的血腥畫面，以及可能由是而生的憐憫之情，往往就在「得寶」的喜悅中被稀釋了。

設若類型故事為一時代之集體記憶，則大象報恩故事戮力渲染象牙之稀世無價，當反映時人酷嗜象牙之文化。由於故事往往按照講述者認同之觀點來陳說，是以唐代此類故事多有俠義敘事及贈牙致富之情節；至於大象遭人剝奪象牙之苦楚以及物種的生存危機，因難與主流價值共鳴，自然進不了唐人的集體記憶。<sup>54</sup>換言之，添入物質欲望之唐代大象報恩故事，無論如何書寫人、象情誼，在其赤裸坦露象牙之酬值時，註定要與大象之真實處境有所扞格。

---

<sup>54</sup> 所謂「集體記憶」，乃指一個社會的共同理念與價值會在無形中介入記憶的選擇過程：哪些該被呈現？哪些該被遺忘？運作其間的是社會所共有的整套信仰與情感，其作用在於創造出價值的判準。參夏春祥：〈文化象徵與集體記憶競逐——從台北市凱達格蘭大道談起〉，收於盧建榮主編：《文化與權力——台灣新文化史》（臺北：麥田出版社，2001年），頁110-111。（DOI：10.29816/TARQSS.199809.0002）

## 五、「貢獻」情節裡的政治意涵

同類型的大象報恩故事固然反映唐人普遍的物質欲望，但在各別篇章裡仍存在講述者自身的文采、意想及歷史記憶。本文所論作品中，《廣異記》所收〈閩州莫徭〉、〈安南獵者〉特於大象報恩之主要情節外疊加有關「貢獻」之敘事，並連結帝國邊陲之異族，隱約帶有某種政治內涵，有待進一步發掘。魏徵〈論御臣之術〉曾言：「夫美玉明珠，孔翠犀象，大宛之馬，西旅之獒，……重譯入貢，道路不絕者何哉？蓋由乎中國之所好也。」（《全唐文》，卷 139，頁 622）這些貢品背後既散發濃厚異域風情，更見證唐帝國串聯起當時陸海絲綢之路的繁榮景象，以及其在華夷秩序上的主導性。然者，《廣異記》兩篇異文所出現之貢獻情節究竟暗藏何種權力結構？作者戴孚立身中唐而回望往昔輝煌，又欲藉既有之類型故事傳達什麼訊息？

### （一）「會獻天子」與「歸白都護」的權力結構

在〈閩州莫徭〉裡，莫徭所得之象牙歷經胡商爭買風波後，終由縣府裁定「會獻天子」，進而截剖為「龍簡」，成為皇家未來舉行齋醮儀式之重要物件。<sup>55</sup>至於牙主莫徭，武后謂其「汝貌貧賤，不可多受錢物」，故「每年給五十千，盡而復取，以終其身」。其人雖獲賜無盡財富，終身不愁吃穿，卻也被貼上身分卑微之標籤；而象牙所代表之上流品味，洵非「貧賤」之莫徭所能匹配。另在〈安南獵者〉中，獵者發現數萬枚象牙後並未據為己有，而是「歸白都護」，再由都護遣使取回，造成嶺南象牙市價大跌。故事並未明言獵者所得之報償，其在通報消息後便在作品中變得蒼白失語，接下來全由都護府展示象牙、獸骨等戰利品，進行資源分配，與〈閩州莫徭〉一樣，咸在器物「擁有權」之劃分中映現官方地位之

<sup>55</sup> 所謂「龍簡」乃道士齋醮時以朱書於簡，因飾以龍形，故名。唐代帝王因崇信道教，視「投龍簡」為皇家祈求社稷平安之重要儀式。徐鉉〈茅山紫陽觀碑銘〉嘗記唐玄宗親臨紫陽觀，以「芝泥龍簡，投奉相望」。（《全唐文》，卷 884，頁 4096）

優越。

朝廷既有所好，地方政府便有徵收物產之責，不論「會獻天子」或「歸白都護」，其實皆隱含「百姓一州牧一朝廷」之輸送脈絡，當係唐代「土貢」制度之迂迴投射。據杜佑《通典·食貨六》所載：

天下諸郡每年常貢：按令文，諸郡貢獻皆取當土所出，准絹為價，不得過五十疋，並以官物充市。所貢至薄，其物易供，聖朝常制，於斯在矣。其有加於此亦折租賦，不別徵科。<sup>56</sup>

簡言之，唐制規定之土貢珍品須為當地特產，所獻物資之總值亦有限定，若超出其量則可折抵賦稅，力求貢品「易供」而「至薄」，減輕百姓額外負擔。另據《通典》同卷所載「諸郡每年常貢」，安南都護所轄日南郡規定貢獻「象牙二根」，閩州之規定則為「重連綾二十疋」；<sup>57</sup>衡諸上述兩篇故事，安南人與莫徭人所獻象牙不僅超出常貢規定，更已溢出五十疋絹之市價。在此無意深究故事之違制現象，畢竟小說創作向有其虛構、渲染成份；但其超出常貢規定的獻牙情節卻間接反映唐人之象牙狂熱，並在尊卑貴賤的權力結構作用下，使王公豪族得以過量地遂行其奢侈欲望。

除身份地位的尊卑懸殊外，〈閩州莫徭〉與〈安南獵者〉猶在族群意識上隱含「中心與邊陲」之權力結構。莫徭乃唐時散居江淮之間的少數民族，<sup>58</sup>以射獵維生，風俗與中土迥異，在唐人眼中乃屬異域之蠻貊。<sup>59</sup>因此，故事中的牙主莫徭不

<sup>56</sup> (唐)杜佑：《通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文淵閣四庫本)，卷6，頁60。

<sup>57</sup> 《新唐書·地理志》所羅列日南郡及閩州之土貢物品更多，但同樣僅有日南郡明載貢獻象齒，閩州部份未及見。

<sup>58</sup> 唐玄宗開元29年下詔云：「又江淮之間，有深居山洞，多不屬州縣，自謂莫徭。」(《冊府元龜》，卷162，頁814)

<sup>59</sup> 常建〈空靈山應田叟〉詩有「言語皆啞咬」、「莫徭射禽獸」、「敬君中國來」、「異域終難交」等語，劉禹錫〈連州臘日觀莫徭獵西山〉詩有「蠻軍步伍器」之句，據此故言。分見(清)清聖祖御製：《全唐詩》(臺北：宏業書局，1977年)，卷144，頁1460；卷354，頁3972。下引其書徑誌卷次、頁碼。

僅身份低微，相較於壓軸出場而代表大唐之武后，更有著強烈的爾我之別。至於身為安南人的獵者，殆為唐時生活於越地的邊境民族，殷堯藩〈偶題〉云：「越女收龍眼，蠻兒拾象牙。長安千萬里，走馬送誰家。」（《全唐詩》，卷 492，頁 5574）紀錄了「南蠻」採集象牙的勞動生活；而在朝廷要求下，這些象牙必須快馬加鞭送往遙遠的京師，換言之，在象牙產業鍊上，安南人乃順服中土需求，扮演供應及從屬的角色。

在以華夏為正統之觀念下，莫徭人與安南人皆只是唐人眼中的周邊異族，有其獨特的血統和文化樣貌。其地雖於唐時設立郡縣，納入中國版圖，但誠如上文所述，其人猶被視作「非我族類」之蠻夷。王明珂指出，華夏統治階層與知識份子經常強調邊緣人群的「異類性」，藉以強化華夏間的族群認同，其現實目的則為保護、爭奪生活空間的資源。<sup>60</sup>循此，唐王朝將閩州及安南納入治理範疇，實為取得當地資源之分配權；而其境內之莫徭人與安南人，則依「華夏/荒夷」之位階次序而被排除在權力核心之外，淪為採收象牙之勞力階層，故事最終「會獻天子」、「歸白都護」之緣由便在於此。同時，呼應唐王朝的「中心」立場，知識份子屢屢傳佈或建構「感化邊陲」之論述，以維繫其管轄的合理性，如權德輿以「懷來夷落，嚮方率教」讚許張鎬作鎮江西時聘用莫徭人為幕僚，柳宗元亦稱交州自入唐以來「稍臣卉服，漸化椎髻，卒為華人，流我愷悌」，<sup>61</sup>皆帶有中心教化邊陲之意味。然此所謂懷柔遠夷之說法其實是個不斷征服、移民和同化的過程，<sup>62</sup>中原王朝掌握四方諸夷之具體作法仍在任土作貢，<sup>63</sup>安南與莫徭作為王土王民的實

<sup>60</sup>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頁 461-462。

<sup>61</sup> 權德輿：〈太中大夫守國子祭酒潁川縣開國男賜紫金魚袋贈戶部尚書韓公行狀〉，《文苑英華》，卷 973，頁 5121。柳宗元：〈為安南楊侍御祭張都護文〉，《全唐文》，卷 593，頁 2658。

<sup>62</sup> 葛兆光以為，政治秩序的達成，首先仰賴馬踏匈奴的軍事力量，其次則由於安史亂後大量漢人南徙，加速百越荆蠻洞溪區域的漢化，最終走向制度趨同和文化認同。參氏著：《歷史中國的內與外——有關「中國」與「周邊」概念的再澄清》（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年），頁 34-39。

<sup>63</sup> 李商隱〈為大夫安平公華州進賀皇躬痊復物狀〉：「（藩方）將稱慶於天朝，必展儀于土

質意義亦在於此。

不可諱言，西南或南疆向來是唐王朝流放官員之所，是士人視為畏途的瘴癘之地；<sup>64</sup>然在部份遷客騷人之詩文中，如岑參〈送楊瑗尉南海〉：「此鄉多寶玉，慎莫厭清貧。」（《全唐詩》，卷 200，頁 2073）已嘗試以安慰性修辭賦予邊地不同理解。杜甫〈爲閬州王使君進論巴蜀安危表〉：「是蜀之土地膏腴，物產繁富，足以供王命也。」（《全唐文》，卷 360，頁 1615）乃嘗試從物產殷充來定義邊地價值。韓愈〈送鄭尚書序〉則敘南海諸國「舶交海中」，並以綏撫之立場云：「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瑇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文苑英華》，卷 730，頁 3792）既將邊地「窮荒苦寂」之刻板形象翻轉爲「奇貨可居」之貿易榮景，同時亦透過物產之開發納蠻夷於華夏秩序中，易言之，恰是犀、象、玳瑁等寶物使版圖上的南疆具備政治意義。由是以觀，作爲土貢之邑的閬州與安南，在中唐文人之物產敘事裡往往與帝國形成權力上的連結，因此，〈閬州莫徭〉與〈安南獵者〉所描述之獻牙情節，不僅在華夷關係上強化了中心與邊陲的階序格局，猶在酷嗜象牙之中土文化被覆下，銘刻了邊地的資源、屬性及政治價值。

## （二）獻牙情節所折射之盛世記憶及垂化修辭

眾所周知，文學作品向與作者所處時空背景有著密不可分之關係，故唯有進一步知人論世，方能讓文本之詮釋有個完滿著落。戴孚爲肅宗至德二年（757）進士，時值安史之亂（755-763），《廣異記》中〈笛師〉、〈滎陽鄭會〉等十來篇故事皆述及此禍，〈鄭相如〉一篇更云：「國家至開元三十年，當改年號，後十五年，當有難。天下至此，兵革興焉，賊臣篡位，……此後蒼生塗炭未已。」（《太平廣記》，卷 82，頁 531）是以，顧況在〈戴氏廣異記序〉中特言：「至

---

貢。」（《全唐文》，卷 772，頁 3566）後唐明宗針對貢物稽遲而敕旨云：「方州所尚，土貢爲先。」（《冊府元龜》，卷 154，頁 714）據此故言。

<sup>64</sup> 師永濤：《走進唐人的日常——從衣冠、食物、婚姻、藝術了解唐代生活史》（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20年），頁 178-181。

德初，天下肇亂，況始與同登一科。」（《全唐文》，卷 528，頁 2377）那是他們一生都難以抹平的歷史疤痕。期間，唐軍駐守嶺南之軍隊多北調，西原蠻、莫徭蠻及安南陸州洞蠻皆趁機叛變，<sup>65</sup> 王朝尊望一落千丈；嗣後叛亂雖平，但內憂外患踵至，吐蕃、南詔等異邦崛起，李唐已失卻崇盛赫奕之聲威與光芒。歐麗娟以為，對歷經喪亂的唐代士人而言，大唐盛世是一個「既令人驕傲依戀、復心生歎惋惆悵」的失樂園，相關文學作品充滿了懷慕及嘆惋之情。感受敏銳的文人在盛衰劇變之際，因彷徨於未來的難以捉摸，只好不斷透過書寫追憶已逝去的幸福時光。<sup>66</sup>

在此衰亂氣氛中，某些將目光轉向往昔輝煌之敘事，其實反映了中唐文人對家國自信的嘗試追尋和重建。<sup>67</sup> 就〈閩州莫徭〉與〈安南獵者〉二文而言，由於時間署為「天后」及「開元」時，遂使作品染上一層「追憶」色彩，而故事中的「獻牙」情節則引領吾人一窺盛唐氣象，武后天顏之崇聖、安南都護轄治之牢穩，以及商業貿易之繁榮皆彷彿歷歷在目，喚起時人對盛世的緬懷。其中，〈閩州莫徭〉所化用之「胡人識寶」情節亦見諸同書〈青泥珠〉一文，敘「則天時」西國進獻青泥珠等寶物；（《太平廣記》，卷 402，頁 3237）此類傳說反映唐朝風華藻耀而又海納百川的國際交流，眾多胡商紛至沓來，開拓唐人之識見與視野，彰顯出唐人對外來文明兼容並蓄的文化自信。<sup>68</sup> 在那個時空裡，四方諸夷臣服於大唐，透

<sup>65</sup> （宋）歐陽修：《新唐書·南蠻下》（臺北：鼎文書局，1985年），卷 222 下，頁 6329。

<sup>66</sup> 歐麗娟：《唐詩的樂園意識》（臺北：里仁書局，2000年），頁 165、168。

<sup>67</sup> 李紀祥曾言，表述歷史的「後來涉入之筆」充滿著敘事者的移情、想像與詮釋，在「居今識古」的認知活動中，既呈現往昔歷史圖像，也關涉現今情境。參氏著：《時間·歷史·敘事》（新北：華藝學術出版社，2013年），頁 10-17。

<sup>68</sup> 此外，程蕃認為，許多寶物源自西域，實際反映初盛唐時期各國臣服於中國，向中國進貢貴重寶物的事實；而西域胡人遠來中國尋寶，有的寶物甚至牽涉到他們的國計民生，殆投射出唐人的民族自豪感，並見證當時中外秩序之「維繫與依存」。見程蕃：《中國識寶傳說研究》，頁 119-120。除〈青泥珠〉外，《廣異記》「胡人識寶」之篇章尚有〈成弼〉、〈徑寸珠〉、〈寶珠〉、〈紫辣羯〉等。其中，〈寶珠〉為武后時事，敘胡人前往中國求寶，體現程蕃所言盛唐氣象；然〈紫辣羯〉乃記肅宗時朝廷向商旅百姓徵稅，以籌措收復二京之糧餉，其所敘胡商以百萬購寶、樂輸其財之事，成了當時兵馬倥傯，人們渴望拯救燃眉之急的心理寫照。從〈寶珠〉等文至〈紫辣羯〉，正呈現盛唐轉入中唐之世變光譜，具像出戴孚此世代文人之生命處境。



過羈縻、冊封、進貢和貿易等方式維繫華夷關係，是唐人自信昂揚的黃金歲月。

我們尚可發現，在關於進貢的論述裡，盛唐君臣散發著無比自信，如貞觀五年（631）林邑國遣使獻五色鸚鵡，太宗詔李百藥作〈鸚鵡賦〉，文云「舉四海而咸鏡」（《文苑英華》，卷 135，頁 620）；九年（635）康國獻獅子，又詔虞世南作〈獅子賦〉，亦云「悅聲教之遐宣」，俱以垂化修辭歌頌朝廷對南海、西域經略有成。自此以下，凡敘外夷貢獻者多秉此論調。另據《冊府元龜》所載，林邑等國在高宗至玄宗朝嘗屢獻馴象，<sup>69</sup>〈越人獻馴象賦〉甚而成爲開元年間舉子之科考試題或習作，<sup>70</sup>兼有揚頌天闕之意。其中，《文苑英華》所收杜洩同題之作云：「性之馴良，表邊夷之向化；體之固實，揣中夏之所尊。」（卷 131，頁 603）儼然視象貢爲華夷關係之表徵，堪稱唐人相關論述之最佳註腳。

在此論述風氣影響下，〈閩州莫徭〉與〈安南獵者〉之貢獻情節誠有表聖皇澤之可能。唯在戴孚所處年代，「群盜方梗，諸戎競侵」，<sup>71</sup>國勢較之盛唐已不可同日而語；因此，稱此貢獻情節體現唐人在華夷秩序上之優越感，固其宜矣，但更確切來說，是中唐士子對文化自信的努力求索和喚回。事實上，中唐士子在闡述進貢之政治意涵時，仍秉持一貫的垂化修辭，如代宗大曆六年（771）文單國王來朝並獻馴象 11 頭，時有宰臣上言：

臣聞《春秋》二百四十年，不紀祥瑞，而載異國之朝；其在《周書》亦美西旅之獻，蓋重其德化及遠，天下大同也。……陛下以至敬事天地，以至孝奉宗祀，武功以定大難，文德以懷遠人，故舊史未載之邦，前王不賓之長，……瞻望中國，知有聖人，踰海而來。（《冊府元龜》，卷 999，頁 636）

<sup>69</sup> 《冊府元龜》「外臣部」之「朝貢三」（卷 970）與「朝貢四」（卷 971）。

<sup>70</sup> 詹杭倫：〈〈越人獻馴象賦〉與杜甫關係獻疑〉，收於謝海平主編：《唐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08 年），頁 62-64。

<sup>71</sup> （五代）劉昫：《舊唐書·代宗本紀》（臺北：鼎文書局，1982 年），卷 11，頁 316。

乃援古論今，重申朝貢之懷柔意義。然值得注意者，引文復將此次遠國來朝歸因於代宗「武功以定大難」（案：當指剿除安史餘孽），燃起國人對中興之熱烈期許，故字裡行間散發著皇風遠洽之自信。而數年後之文單國象貢遂成爲當時知識份子表述「天朝再起」之絕佳契機，毋乃唐人一掃鬱結、揚眉吐氣之定心丸。借彼觀此，〈閩州莫徭〉與〈安南獵者〉裡的獻牙情節或恐即是此時代風氣之產物，其假託盛世回憶而放眼今朝，強調中心對邊陲的絕對優勢，洵有重建唐人家國自信之隱微意義，帝國寶祚畢竟仍得依賴文化論述來支撐。

或許不論國勢如何，唐人始終自詡受天眷命，但在戴孚之世，盛唐確已成爲記憶。站在騷動不安的中唐回首盛唐，故事裡的繁榮景象誠具有撫慰傷痕的正面意義，因爲在小說的世界裡，作者可以任意遨遊往昔之鼎盛，並藉此抵抗內心焦慮，彌補現實的失落。只有透過天馬行空的文學想像，將已逝的盛世再現爲翰墨裡的恆常記憶，他才能克服內心的不安，在步履踉蹌的現實中面對未知的未來。

## 六、結語

唐人小說素來擅以奇幻情節反映世態人情，大象報恩故事亦然。此類作品原圍繞救象義舉及回報，唯經唐人轉述、改寫後，實已糝入時代脈動，呈現唐帝國之精神面貌，在恩報觀念外別寓幽微的社會心理。敘事活動向來易因作者觀點而遮蔽事件某些風景，而當作品置裝爲眾所熟知的類型故事，醞釀出一套反覆搬演的敘述模式，尤可能掩蓋部分幽影，忽略其它值得檢視之面向。作爲研究者，除指出作品直接或間接宣示之旨趣外，猶應嘗試跳脫既有敘事立場，避開思考窠臼，在文本破口中看見隱藏其後的時代徵狀。

本文首先從唐代知識場域考究動物報恩故事，舉凡《搜神記》、《異苑》、《藝文類聚》等漢典，以及《六度集經》、《經律異相》、《法苑珠林》、《大唐西域記》等釋門著作，皆於知識養成及文學傳播有一定影響力，進而繕築唐人的價值觀與創作之資。要言之，佛經文本講究慈悲護生與勸善懲惡，漢籍文本則屢屢張揚福澤豐厚之結局，又或延伸爲人事課題及政治比喻。尤其漢典事例所開展之欲望書寫及權力論述，皆可於大象報恩故事中窺見一二，在借鑑佛經報恩故

事之餘，實已明顯中國化。

唐代大象報恩故事對佛經題材之取鏡主要表現在「援助」與「報恩」情節，但兼有因襲與轉化。在援助部份，〈華容莊象〉與〈閩州莫徭〉承繼其「拔刺」情節，〈淮南獵者〉、〈安南獵者〉、〈蔣武〉則改易為驚心動魄的「除獸」敘事，讀來更添張力，其吞象怪獸之原型則分別源自佛經中的獅子及《山海經》巴蛇。而在報恩部份，雖同樣寓有知恩圖報之品格，但佛經相關文本敘其馱物、禦敵或餽贈佛牙，五篇唐代文本則不約而同言其致贈象牙，此一重要創變恐非本諸大象習性，而是緣於唐人對象牙之珍視與渴求。

唐人對象牙之愛好明顯體現於日常起居目不暇給的象牙製器，並在經典傳播及文學創作見證下深化其上流屬性，象牙所代表之富貴與奢華遂為唐人普遍認知。在此物質文化視閥下，大象報恩故事所刻劃贈牙結局便不僅是知恩圖報如此簡單，而更投射出唐人對象牙之欲望鏡像。事實上，故事鮮明的地域特色誠反映大象已向南退卻之生態事實，邊地確為唐朝象牙之重要來源。此外，〈淮南獵者〉等講述「除獸」奇談之文本，在標榜救象之餘實蠢動著征服大象的渴盼，「俠義敘事」成了「欲望敘事」之背書。於是，文明的暴力被隱匿，物種的真實脈絡被切除，大象報恩故事因此成了一襲美麗的包裝。

包裝在故事裡的，除唐人之象牙渴望外，戴孚《廣異記》所錄〈閩州莫徭〉、〈安南獵者〉猶隱含中心對邊陲的政治論述。二文結尾形容曲盡之貿易現象與貢獻情節，既煥發盛唐燦爛、開放之氣息，且蘊含帝國與周邊異族之間的主從關係。所謂「會獻天子」及「歸白都護」實乃當時土貢制度之輾轉投射，在尊卑貴賤之權力結構作用下，物產敘事誠具有掌握四方諸夷的政治意涵，故事裡的象牙因而成為表述邊地屬性之文學符號。然戴孚所處之中唐，國勢已不復以往崇巍輝煌，巨大的心理落差使得當時士人屢屢透過盛世追憶重建其家國自信，關於進貢之闡述亦多持續一貫的「垂化」論調，並視「象貢」為華夷秩序之表徵。〈閩州莫徭〉、〈安南獵者〉承襲既有的大象報恩故事，表為武后、玄宗朝之紀聞，字裡行間飄溢著王朝看待四夷的優越感；然此盛唐記憶無疑亦透露一個中唐士人對文化自信的上下求索，面對現實的失落與擾攘，乃試圖在不久的往昔尋找撫慰力量。於此，故事不再只是瞭解歷史現象的一扇窗，它本身就參與歷史，在重修唐人光

榮感的過程裡，與帝國的權力運作同聲相應。

總之，大象報恩故事在刻劃義勇救象之同時，也存在唐人的物質欲望與天朝意識。此誠反映唐人珍視象牙之文化心理，以及體物寫志、關懷社會的文學傳統。然當大象繼續被規訓化為「以牙還恩」之角色，帝國櫥窗裡所展示的象牙將被附上色彩鮮明的政經解說，模糊掉大象不斷消殞的巨大痛苦。事實上，象牙及其製品背後是一段集體沉默的獵象史，我們所閱聽之大象報恩故事乃是被選擇及文飾之社會記憶，與「大象退卻」之生態實情存有一段很長距離。

## 徵引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吳) 康僧會譯：《六度集經》(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年，《大正新修大藏經·本緣部上》)。
- (晉) 干寶著，汪紹楹校注：《搜神記》(臺北：里仁書局，1999年)。
- (梁) 寶唱：《經律異相》(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年，《大正新修大藏經·事彙部上》)。
- (梁) 蕭統編，(唐) 李善注：《文選》(臺北：五南圖書公司，1991年)。
- (陳) 徐陵：《玉臺新詠》(臺北：世界書局，1971年)。
- (唐) 牛僧孺撰，程毅中點校：《玄怪錄》(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 (唐) 牛肅撰，李劍國輯校：《紀聞輯校》(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
- (唐) 白居易：《白氏六帖》(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江安傅氏藏本)。
- (唐) 杜佑：《通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文淵閣四庫本)。
- (唐) 李翰：《蒙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山西應縣佛官寺所藏遼刻本)。
- (唐) 段成式：《酉陽雜俎》(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3年)。
- (唐) 徐堅編：《初學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文淵閣四庫本)。
- (唐) 張鷟撰，趙守儼點校：《朝野僉載》(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 (唐) 張讀撰，蕭逸校點：《宣室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 (唐) 樊綽：《蠻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年，琳琅秘室叢書本)。
- (唐) 歐陽詢：《藝文類聚》(京都：中文出版社，1980年)。
- (唐) 釋道世著，周叔迦、蘇晉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 (五代) 劉昫：《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2年)。
- (宋) 王欽若、楊億主編：《冊府元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文淵閣四庫本)。
- (宋) 李昉主編：《文苑英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年)。
- (宋) 李昉等編，汪紹楹校：《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 (宋) 歐陽修：《新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5年)。
- (清) 清聖祖御製：《全唐詩》(臺北：宏業書局，1977年)。
- (清) 董誥主編：《全唐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 二、近人論著

### (一) 專書

- 王夢鷗：《唐人小說研究：纂異記與傳奇校釋》(臺北：藝文印書館，1971年)。
- 王國良：《搜神後記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8年)。
- 王國良：《續齊諧記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
- 王國良：《冥祥記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
- 王立：《武俠文化通論續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
-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
- 左松超：《說苑集證》(臺北：國立編譯館，2001年)。
- 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說輯釋》(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
- 李紀祥：《時間·歷史·敘事》(新北：華藝學術出版社，2013年)。
- 周楞伽：《裴劍傳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 季羨林：《比較文學與民間文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
- 吳海勇：《中古漢譯佛經敘事文學研究》(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會，2002年)。
- 袁珂：《山海經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82年)。

- 孫鴻亮：《佛經敘事文學與唐代小說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 師永濤：《走進唐人的日常——從衣冠、食物、婚姻、藝術了解唐代生活史》（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20年）。
- 陳寅恪：《陳寅恪集·寒柳堂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
- 張國風：《《太平廣記》史話》（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年）。
- 葉慶炳：《古典小說論評》（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5年）。
- 程薔：《中國識寶傳說研究》（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年）。
- 程毅中：《唐代小說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
- 葛兆光：《歷史中國的內與外——有關「中國」與「周邊」概念的再澄清》（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年）。
- 魯迅：《魯迅小說史論文集：中國小說史略及其他》（臺北：里仁書局，1992年）。
- 劉守華：《中國民間故事史》（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 劉守華：《佛經故事與中國民間故事演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 劉惠卿：《佛經文學與六朝小說母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
- 蔣述卓：《佛經傳譯與中古文學思潮》（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會，2002年）。
- 鄭振鐸：《鄭振鐸古典文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 歐麗娟：《唐詩的樂園意識》（臺北：里仁書局，2000年）。
- 錢鍾書：《管錘編》第2冊（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1990年）。
- 龔鵬程：《中國小說史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3年）。
- （英）伊懋可（Hark Elvin）著，梅雪芹等譯：《大象的退卻：一部中國環境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年）。
- （美）丁乃通：《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索引》（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
- （美）Elizabeth Freund 著，陳燕谷譯：《讀者反應理論批評》（臺北：駱駝出版社，1994年）。
- （美）薛愛華（Edward Hetzel Schafer）著，程章燦等譯：《朱雀：唐代的南方意

象》（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

(二) 期刊論文

張潔：〈論中國古代的象牙製品及其文化功能〉，《中州學刊》05期（2009年），頁192-194。

蔡苾：〈「拔刺報恩」故事的印度淵源與發展演變〉，《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03期（2017年），頁42-47。

(三) 論文集論文

夏春祥：〈文化象徵與集體記憶競逐——從台北市凱達格蘭大道談起〉，收於盧建榮主編：《文化與權力——台灣新文化史》（臺北：麥田出版社，2001年），頁107-148。（DOI：10.29816/TARQSS.199809.0002）

夏廣興：〈隋唐五代小說採摭佛典題材探微〉，收於陳允吉主編：《佛經文學研究論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440-494。

詹杭倫：〈〈越人獻馴象賦〉與杜甫關係獻疑〉，收於謝海平主編：《唐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08年），頁51-66。

羅聯添：〈劉賓客嘉話錄校補及考證〉，《唐代文學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年），頁683-786。

(四) 學位論文

陳宥任：《中國歷史上的象與象牙》（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6年）。

(五) 電子資源

悟醒譯：《本生經》第156則〈無私心本生譚〉，「CBETA Online」（<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上網檢索日期：2021年12月19日。）

# The Empire's Viewpoint: A Fresh Look at the “Elephant Repayment” Stories in Tang Dynasty

*Deng, Yu-Sheng*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 Abstract

All the time, the animal repayment stories made an impression of kindness and harmony by their affectionate plot. And so is the “elephant repayment” stories in Tang Dynasty. However, when we inquired into the origin and innovation about the type of story, we would find some thought-provoking thing in the text's cracks, cultural reflection, pulse of the times, for instance. This essay took five Tang Dynasty texts as the investigated object, to retrace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Chinese books and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to look at their inheritance and transformation for the plot which described helping elephants, pulling out the thorn, killing the monster included. In addition, the archetype of monster that swallowed elephants is also inspected. The kind of story may be based on the Buddhist philosophy of compassion and animal protection, however, they followed the style of Chinese books in the ending, intensified their generous rewards and human affairs description. The new plot they transformed that described elephants gifted ivories is rooted in the fashion of the Tang Dynasty, therefore, the kind of story has become the mirror image of the Tang people's ivory addiction. Besides, the two stories



in “*Guangyiji*” are especially worth mentioning, in the latter part of the works, the “trade” and “Tribute” of ivories are particularly described, and through the character class setting, they expressed the center’s political discourse on the border. The memory of flourishing age referred by story time is the author’s attempt to rebuild the self-confidence of country in Mid-Tang. Briefly, in addition to the original moral meaning, the “elephant repayment” stories in Tang Dynasty showed the deeper spiritual outlook of the Tang Empire.

**Keywords:** Animal Repayment, Elephant Repayment, Ivory, Tribute, “*Guangyiji*”